

纪念交通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暨迁校四十周年

百年回首



《百年回首》编辑组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前　　言

从 1896 年到 1996 年,交通大学走过了 100 年的漫长历程。100 年来,交通大学历经艰难曲折,不断发展壮大,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庆祝交通大学建校 100 周年暨迁校 40 周年之際,为了展现交通大学的历史发展概貌和各项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总结各方面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展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学校面貌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学校领导和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关怀下,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书,作为向百年校庆的献礼。

本书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名为“交大发展追踪”,其中各个专题反映的是交通大学百年发展历程中的主要的历史事件,以及主要方面的工作的发展和成就。第二部分名为“院系发展史话”,其内容是以学校体制改革后的各学院为单位,分别叙述了各学院的机构组成和历史沿革、发展概况和取得的主要成就。这些内容从不同的方面概括了历史,展示了成就,总结了经验,使我们从中听到历史的回声,看到历史的风貌,受到激励和鼓舞。当然,交通大学的发展成就是多方面的,上述内容只是它的一个“摘要”,一个缩影。

在本书编辑中,由于各专题历史跨度较大,各专题作者完成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资料收集工作,在写作中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百年回首》编辑组

1995 年 12 月

目 录

交大发展追踪

独具特色的南洋公学创建之路	(1)
迁校——交通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1)
继承优良传统,深化教学改革,开创一流教学水平	(19)
研究生教育跻身一流水平	(41)
科研工作硕果累累 21世纪再创辉煌	(46)
面向世界,建设高水平国家实验室	(57)
师资队伍建设——通向新世纪的桥梁	(67)
从创办实习工厂到发展科技产业	(71)
国际学术交流源远流长	(80)
学生工作,一贯百年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	(85)
从藏书楼到现代化的图书馆	(95)
发展电化教育 推进教学改革	(106)
计算中心的回顾与展望	(120)
出版社创业历程	(125)
交大体坛,盛誉佳话传百年	(130)
离退休工作——夕阳工程,万岁事业	(141)
医疗保健——75年发展,服务师生员工	(147)
百年建设今胜昔	(151)
九三学社交大基层组织——40年风尘岁月,永记民主与科学	

.....	(156)
为民主富强而奋斗的中国民主同盟西安交大总支部.....	(166)
发展中的后勤工作.....	(171)

院系发展史话

理学院.....	(181)
电气工程学院.....	(191)
机械工程学院.....	(20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26)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30)
建筑工程与力学学院.....	(25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64)
化学工程学院.....	(269)
工程与科学研究院.....	(274)
管理学院.....	(279)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88)
后记.....	(293)

独具特色的南洋公学创建之路

凌安谷 谢立勤

交通大学始称南洋公学，1896年由清末洋务派官员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盛宣怀1895年在天津创建了中西学堂以后，鉴于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要，又于次年在上海创办了有别于津校的南洋公学。北洋、南洋两校遥相呼应，开创了中国近现代高等、中等、初等和师范教育的先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中，起到了划时代的影响。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他是中国清末最具实力的洋务派官员。1870年入李鸿章幕，1873年任轮船招商局会办，1880年办电报局，1893年筹办华盛纺织总厂，1896年接办湖北汉阳铁厂兼筹办芦汉铁路，1898年开办萍乡煤矿，至1908年合并汉阳制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1902年任工部左侍郎、会办商约大臣，1910年任邮传部尚书，次年为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对盛宣怀的功过评价，在史学界争议不少，但在肯定他对发展中国生产力的贡献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对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开创性贡献，自然也功不可没。

笔者在校档案馆阅读了南洋公学创办时期一大批档案材料和

文献资料,深为其所开创的办学道路中的创造精神所折服。笔者以为,创建南洋公学中独具的特色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办普通教育,先办高等,后办中、初等, 这与正常的顺序相反,体现了开拓精神

鸦片战争以后至 19 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境内有洋务派官僚、外国传教士和维新派代表人物三支力量举办具有近现代教育含义的学校,如同文馆和各类方言学堂、武备学堂、实业学堂、时务学堂,以及传播近代知识的某些书院,这些办学机构都是应急或具有特定目的而开办,其程度均未超过中等,属专门或职业教育,不属于普通教育的范畴。

西方的大学,是在众多的低层次的“文法学校”、“歌咏学校”中间,从某些具有特殊声望的科目、拥有一批优秀教师,或其地理位置优越等条件的学校发展起来的,最早大约在 12 世纪中叶。其办学层次由低到高是显而易见的。

而 19 世纪后期的中国教育,大量的是为应付科举而举办的私塾或书院,随着西方近代科技、文化、教育的传入,它显得十分落后,属于必须废除或革新之列。因此,当时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能进行近代科学、文化、技术教育的初、中、高等教育机构和制度。在当时条件下,已不可能走西方那样花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时间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自发发展之路。

当时像盛宣怀那样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在洋务实践中深感不懂洋务的高层次人才的急需,认为强国必先兴学树人。“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设立学堂为本”;“西国人才之盛皆由于学堂”;“中外臣僚与夫海内识时务之俊杰,莫不以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为先务之急”。他于 1895 年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内设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每年需银 52 000 两,以开平煤税、电报

局和招商局捐缴拨作学堂经费。头等学堂学制四年，“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次年，他在上海又设立了南洋公学。南洋公学设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以招商、电报两局岁捐 10 万两银为常年经费。“师范院即师范学堂也”，“上院即头等学堂也”。由此可见，盛宣怀所要培养的是懂近代知识、能适应洋务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办的是如国外大学那样的近代高等学校。

盛宣怀对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愿望十分强烈，1896 年他办起南洋公学以后，又嫌它树人速度太慢，“嗣以需才孔亟，经臣奏请，在京师及上海两处各设一达成馆，教成材之士，以收速效”，愿将筹集轮、电两局原捐南洋公学每年 10 万两银先充达成馆之急。后因达成馆未能如愿以偿，故指令南洋公学添设特班。他在特班的批文中说：“公学设此特班，系本达成馆初意，所取必须品学合格，为将来造就桢于大才之用”，“南洋公学添设特班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梁栋之材……但望学成之后，能如曾李（笔者注：指曾国藩、李鸿章）两星……总之，本大臣期望特班极为郑重，断非寻常可比……”。所谓经济特科，是清末特设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人员的科目，目的为培养高层次洋务人才，为适应洋务活动需要而培养高层次人才，这就是盛宣怀在中国创办北洋、南洋两所高等学校的直接动机。

就近代普通教育的办学过程而言，我国先办的是高等学堂，后办中等和初等学堂。当然，对每一学生的教育过程而言，则必须先初等，再中等，后高等，不能颠倒。盛宣怀创办了北洋、南洋两所高等学堂，而当时国内尚无普通基础教育，也就是说还没有小学和中学，这就给已创办的高等学堂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困难。这样做，一方面说明当时对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说明，办学者不怕艰难、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

二、在一所学校中，建立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的配套学制，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创举

在 19 世纪 90 年代，要创办一所高等学校，谈何容易！合格的学生和教师何在？经费何在？在筹备南洋公学时，起初曾准备参照北洋设头等、二等两学堂，后盛宣怀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认为“臣惟师道立则善人多，故西国学堂必探源于师范”，决定学习西方和日本做法，先设师范院，考选成才之士 40 名（多为举人、廪生和贡生），“课以中西各学，要于明体达用，勤学善诲为指归”。然后仿日本师范学校有附设小学校之法，设立外院，招收 10—18 岁聪颖幼童 120 名，由师范生教之。不久以后，外院改为高等小学堂，作为中院的预科，中院又作为上院的预科。这样，一级又一级、一层又一层地往上升，扎实完成从初等经中等到高等的教育任务。在当时中国尚无各类基础教育的情况下，在一所学校中同时完成初、中、高等教育任务，实乃迫不得已，也能看出办学者的气魄和脚踏实地的精神。这是在当时中国所没有，即使在国外也属罕见的。南洋公学的师范院，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之始，外院是中国近代小学之始，这早已为我国教育史界所公认。

三、走从官商合办到政府实业 管理部门办学的路子

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国家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加上认识上不尽一致，要中央政府拿出一大笔钱来办近代高等学堂实非易事。是等待中央政府拨款办学还是另辟蹊径，找到其他办学道路？这个难题摆在当时革新者面前。盛宣怀在洋务实践中不但对办新式学堂、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紧迫性有

了深刻的认识，且具有相应地位和权力。在创办北洋、南洋两校前后，盛宣怀正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和招商轮船局、电报局督办，在国内掌握了巨大的经济实力。

盛宣怀决定以开平煤税及轮、电两局捐银作为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常年办学经费，在中国闯出了一条官督商办高等学堂的路子。在 1898 年《南洋公学章程》一开头就写明“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今上海学堂之设，常费皆招商，电报两局众商所捐，故定名曰：‘南洋公学’”。

盛宣怀的政治生涯随清政府被推翻而结束。而南洋公学虽多次更名，在辛亥革命后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下来，其根本原因是学校越办越好，适应了社会的客观需要；而有各个不同时期的政府实业管理等部门为依托、有相应实业部门作基础，不能不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南洋公学创办之初由盛宣怀直接管理，这一阶段应该说是官督民办的学校；1904 年底以后，依次改由商部、邮传部、交通部、铁道部等管理，此后该校即成为国家实业管理部门管理的学校，尽管其经费较长时间仍由招商轮船局和电报局支付。该校长时期为我国铁路、交通、邮电、航运等实业界培养了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得到了国家实业管理部门和实业界的欢迎和支持。实业与教育的紧密结合，互相支持、相得益彰，成为鱼水相依的关系，这就是南洋公学及以后的交通大学的生命力所在。1937 年 9 月，国民政府决定交大由铁道部划归教育部直辖，在师生的强烈要求下，决定经费仍由铁道部拨给，并由教育部和铁道部聘请的人员、高教司长、校长等组成 9 人校务委员会领导学校，继续与实业部门保持紧密的联系。交通大学走过了从官督民办、国家实业管理部门办到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办的漫长道路。

四、开放、自主，开创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现代教育体系

南洋公学的办学方向，自然充分体现了盛宣怀等洋务派的阶级利益，但由于其在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这点上与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因而，当时南洋公学办学的大方向，也体现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统一意志。

南洋公学既然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它当然离不开学习和引进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管理知识，离不开对外国开放。在当时闭关锁国、封建旧礼教盛行以及某些人崇洋媚外思想严重的情况下，要做到既对外开放又坚持自主原则，困难和阻力是相当大的。公学创办初期，曾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令驻外使领馆收集世界各国著名大学的办学章程；并派人到美、英、比、法、德、奥、意、日等国高等学校考察；聘请美国人福开森为监院，担任似今常务副校长或教务长的角色，并聘任了若干名洋教习担任西课教学任务；从1898年起公学就耗费很高代价派出数十名学生赴日、英、美、比、德等国一些著名大学留学；公学还专门设立了译书院，几年内翻译了日本的有关兵政、理财、商务、国政、教育等著作40余部；购置了一批西文图书和外国仪器……这些做法，即使从现在的眼光看，对外开放的深广度也是值得称颂的。

南洋公学办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虽然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学习和引进国外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但又不失自主办学的基本原则。有人认为当时贯彻实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教育方针，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其目的是以封建伦理纲常为基础，辅以采纳西方强国之术，这话不无道理。但是，这仅仅看到了一个侧面，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贯彻这一方针，更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更有利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办学原则，

更有利于既吸收外国之长而又不全盘照搬照抄西方教育制度和方法。因此，当时贯彻实施这一教育方针，从总体看是积极的，其客观效果也是好的。

盛宣怀对南洋公学贯彻这一教育方针是十分精心的，他挑选何嗣焜为公学总理，因何“学术湛深，不求闻达。臣与纵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考核程功次序，极为精邃……”，可以看出，不仅仅因为他是盛的同乡而被选中的。从学校的领导成员看，盛亲自任督办，既作为上级主管，又类似于董事长；何嗣焜为总理，相当于校长；聘任美国人福开森为监院，其权力虽不小，月薪高于总理二倍半，但合同明文规定“监院应听总理节制，即在总理领导监督下开展工作。1901年10月根据国家有关章程，决定将监院福开森裁撤。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由中国人自己领导，这个概念十分清晰，与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截然不同。公学为防止只重西课而忽视中课倾向，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如：规定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是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语言的能力；公学章程规定设监华课总教习和监西课总教习，从组织上保证了华课的地位；公学奖励办法规定，“视中课、算学、英文三项积分而定，一项不及格者不奖”；在课程设置上，对“中学”要求很高，并逐步形成制度和传统；在当时既无西课教材也无中课教材的条件下，在组织翻译“西学”的同时，鼓励中课教习编写教材，公学所编的《蒙学课本》、《笔算教科书》、《本国初中地理教科书》、《物算教科书》、《南洋公学新国文》、《中学国文新读本》等中文教材，对当时中国近代教育影响极大；到1907年唐文治这位国学大师任校长以后，在设置铁路、电机科的同时，设立了国文科，创中国高校中文系之先例。招生时首先考虑国文成绩，唐文治校长每星期日亲自给学生授课，每年进行一次全校国文会考。把国文作为高校的主课，是我国近代高等工业学校学工与学文相结合的最早尝试。福开森在回忆中说：“在汉语教学中，我们废弃了八股文，而要求学生每周写作文。我们为师范生开设了历史、诗歌和作文等专门课程。就我所知，这个学院是开创本国语言和文

学的现代教学体系的第一所院校。”福开森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认为这是轻视西学的表现，但他对南洋公学重视本国语言和文学的以上评价，应该说是客观和公正的。

五、筚路蓝缕，勤奋治学，以优异成绩赢得赞誉

南洋公学从初创时培养新式从政人才，到后来逐步转向实业教育，一贯重视教育质量。首任总理何嗣焜和更名为高等实业学堂后的监督（不久改称校长）唐文治等，对师生要求极为严格，规定教学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底为基础。因此，学校的教育质量一直很高。

然而，由于公学是官督民办，不属于国家和各省官办之学堂，因此，清廷官方发布的一些规定，就没有照顾到南洋公学的特点。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廷政务处礼部所拟《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对各省府州县所办的学堂，可按程度给予增附生功名，而对办得早、质量高的南洋公学却未给予同等待遇，致使“诸生遂不免长虑却顾，甚至辍业他往，废于半途。”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盛宣怀奏《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对此事据理力陈：“拟请朝廷明降谕旨，准南洋公学毕业学生，照政务处礼部所拟学堂章程，一律办理”，“诸生已有五年功课，自较各省新入学堂者所造为深，其卒业亦将在各省学生之先，此臣所以不能不汲汲上请者也”。朝廷将此折批交管学大臣议奏。管学大臣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七月遵旨议奏：“该公学在未定章程之前所设，各学生并未经官考试，与各中学之由小学堂考试升入者不同，暂无庸给予出身。”未能获得解决。

学校主事和师生对待遇不公而蒙受的委屈，并未耿耿于怀，而是筚路蓝缕，勤奋治学，以优异的实绩去赢得声誉。1909年（宣统元年）十月，学部根据各省部分高等学堂对学生程度漠不关心，考试分数宽滥的情况，上报《奏为报部毕业之高等学堂名实多不相

副，拟嗣后一律调京复试再行奏奖并定拟办学不实处分折》提出：“其程度不符者，均不准毕业。如程度不符之人数至三分之一者，该省提学使及该学堂监督均由臣部按其任事之久暂，定其处分之轻重，指名参奏。”经奉旨：“依议钦此”。同时，该部上报《奏为会核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铁路科学生毕业试卷照章请奖折》和《奏为会核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附属中学毕业学生试卷分别给奖折》提出：“该学堂铁路科毕业学生吴思远、高恒儒、潘善闻、胡士熙、郑家斌等五名，均经考列最优等，照章应准作为举人以知州尽先选用，以资鼓励。”1910年（宣统二年）又具奏请奖最优等之俞亮一名，优等之王绳善等五名。“所有列入最优等之李大椿，……等十名，拟作为拔贡；列入优等之周象贤，……等十五名，拟作为优贡，……”学部于1911年（宣统三年）6月，根据调京复试结果，具奏《复试各省高等毕业生事竣拟就成绩高下将各该学堂管理员教员分别举劾》一折称：“查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之铁路科及江苏高等学堂之一、二类、奉天优级师范数学理化选课、湖北理化选课各生，在臣部复试成绩颇属优异，而该学堂平日分数皆极为谨严，具见教授，管理员均能切实从事，拟由臣部咨行该部及该省查明该学堂监督教员銜名，咨报臣部奏请传旨嘉奖。”同时指名批评了几所复试成绩低下的高等学堂：“该学堂教授之敷衍，管理之宽纵，可想而知”，“将……学堂之监督教员……从速撤换并将銜名呈报臣部，将其办学劳绩注销，以示薄惩”，奉旨“依议钦此”。可见，当时我校毕业生质量已列为成绩最好的四所高校之首，并为清政府明文表彰，由于教学成绩卓著，学生作业和成绩送有关国际博览会展出，曾先后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获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金奖，1911年（宣统三年）获意大利都朗国际博览会最优等奖，1915年（民国4年）获美国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大奖。唐文治校长同时荣获1915年美国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荣誉奖。我校由此名扬遐迩，声誉斐然，为“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传统，打下了基础。

南洋公学先后更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

业学堂、南洋大学堂、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交通部南洋大学、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和交通大学。建国以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需要，经国务院决定，1956年交通大学迁往西安，1957年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在大部分系科专业和师生迁往西安，并将两地有关院校分别进行调整的基础上，1959年国务院决定西安、上海两部分分别独立设置并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校，继承发扬了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为我国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为发展科学技术作积极贡献。

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迎来建校百年大庆。温故而知新，回首南洋公学创建之路，诸如：既坚持对外开放和学术交流，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办学原则；对学生必须重视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教学，继承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传统；高等工业学校在取得政府支持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与实业部门的紧密结合，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有好的校长、高质量的教师队伍、稳定的经费来源，有好的校风学风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必要条件，等等。这些经验，对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将大有裨益。

迁校——交通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凌安谷 姜士馨

1955年4月，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揭开了交通大学波澜壮阔的迁校实践的序幕。

1956年7月交通大学首批教职工迁往西安，1957年4月起的迁校问题全校性讨论和迁校方案的调整，以及随后的大部分系、专业和师生完成西迁，到1959年7月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独立成为两所学校，这是交通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一、迁校的决定及其原因

为什么会有交通大学迁校？这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建设方针有关。

1953年7月，美国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虽然已被迫停止，但帝国主义势力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美国第七舰队仍盘踞在台湾海峡，庇护国民党集团对我东南沿海进行骚扰和破坏，叫嚷准备进攻大陆。一时，黑云密布，东南沿海局势十分紧张。根据当时中央的方针，上海要压缩人口，动员疏散；要组织重要的工厂学校内迁，

以防万一。

高教部党组根据中央的方针,于1955年3月30日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我们根据中央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方针和沿海城市基本建设一般不再扩建、新建的指示,重新研究了沿海城市高等学校的分布情况和今年的基本建设任务”,“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将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交通大学等校的电讯工程有关专业调出在成都成立电讯工程学院”,“原计划今年成立的造船学院,因学校性质的关系,仍拟设在上海,暂借用交通大学的校舍进行招生,不另建校舍”。这个报告经国务院二办林枫主任转呈陈毅副总理,后经陈云副总理于4月7日批示同意,并经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阅圈。

根据高教部通知,交通大学彭康校长4月9日起在校务委员会和各级组织对迁校问题作了传达和贯彻;讨论和公布了《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成立迁校委员会和领导小组;派任梦林总务长等到西安察看并最后由彭康校长等亲自选定校址;成立驻西安办事处,开展征地和基建工作;组织赴西北参观团,开展宣传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

1956年,东南沿海局势有所缓和,6—7月,高教部、国务院根据交大和上海市委的反映,对交大迁校问题作了复议。高教部认为:西北地区没有一所水平较高的工科大学,交大今后要增办新专业,在上海受校舍限制,而西安已完成了大量基建,已有一部分员工和家属迁至西安,从长远打算,仍按原决定内迁西安较好。陈毅副总理也主张交大西迁,最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同意搬,必须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于是,交大仍按原计划内迁,并由交大负责为上海筹建一所南洋工学院,以解决上海方面的需要。

二、首批师生迁到西安

1956年7月,交通大学开始了大规模的迁校行动。7月20日,张鸿副教务长等第一批教职工和家属迁往西安;8月10日,苏庄副校长率领师生员工和家属上千人乘专列开往西安;交大校刊和档案也率先迁到西安。一年级新生2100多人,9月初直接到西安新校址报到,9月10日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这时,交大在西安共有学生3900多人,教职工815人(其中教师243人),家属1200人,一所6000人规模的交通大学在古城西安新址矗立起来了。

首批迁到西安的师生员工情绪热烈,干劲十足。当时基建正在紧张进行,不少大楼还未竣工,道路还未铺设,各方面条件比较差。交大西安分党委提出:“团结协作,艰苦奋斗,完成搬迁,办好学校”的号召,大家较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积极搞好校园建设,并为留上海师生全部迁来西安作好准备。迁校师生员工团结互助,克服困难,认真教学,积极工作,刻苦钻研,蔚成风气,充分反映出迁校师生安居乐业,决心扎根西北的愉快心情。

三、迁校问题全校性讨论和方案的调整

1957年春,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交大师生员工在学习讨论中,不少人认为迁校会影响招生质量,削弱师资力量,与工厂、科研机构的结合不利,并认为这是当前学校中最突出的矛盾。校常委会研究后,决定组织以陈大燮教务长为首的五人小组,研究处理迁校问题。为了吸取大家意见,决定暂时停止实验设备的拆卸和西安新校址的基建工作。西安、上海两部分师生运用各种方式,大鸣大放,进行广泛讨论。5月